

曹順慶 等著

中國古代文論話語

巴蜀書社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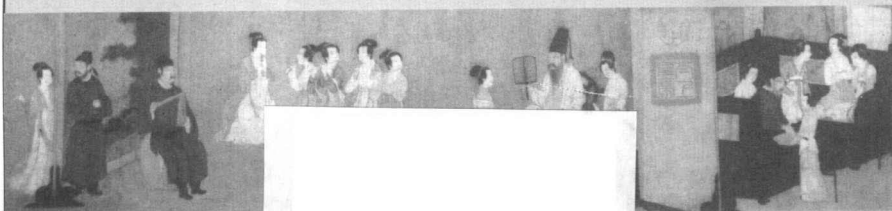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I 206.2/364

中國古代文論話語

曹順慶 李清良 傅勇林 李思屈 / 著



巴蜀書社

2001·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中國古代文論話語/曹順慶等著. —成都: 巴蜀書社,
2001.7

ISBN 7-80659-213-X

I. 中... II. 曹... III. 語言學—研究—中國—古代
IV. HO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1) 第 021133 號

策劃組稿: 陳大利 李 蓓

責任編輯: 陳大利

封面設計: 文小牛

中國古代文論話語

曹順慶 等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 (028) 6656816

發行科電話 (028) 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金龍印務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3.125 字數 315 千

2001 年 7 月第一版

200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 冊

ISBN 7-80659-213-X/1·76

定價: 28.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電話號碼: 5651045 5651203

目 錄

緒 論 重建中國文論話語	(1)
引 言	(1)
第一節 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與中國 古代文論話語	(3)
第二節 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基本路徑及其方法	(25)
第一編 言、象、意、道：從存在到超越	(43)
引 言	(43)
第一章 中國傳統理論關於語言問題探討的歷程 ...	(44)
第一節 先秦時代對語言問題的初步探討	(45)
第二節 漢魏至隋唐對語言問題的進一步探討	(60)
第三節 宋元明清時代對於語言問題的全面探討	(73)
第四節 中國古代探討語言問題的基本精神 ...	(100)
第二章 關於語言問題的中西對話	(105)
第一節 語言與世界	(105)

第二節 語言與人	(113)
第三節 理解語言	(124)
第四節 超越語言	(132)
第五節 中西語言問題對話的理論結晶	(137)
第三章 語言問題新話語的實際操作	(144)
第一節 “以言去言”	(145)
第二節 “得意忘言”	(150)
第三節 “立象盡意”	(152)
第二編 以少總多：詩性智慧的和弦	(156)
引 言	(156)
第一章 “以少總多”說的歷史發展	(161)
第一節 “以少總多”說的萌芽與發軔	(162)
第二節 《易經》與“以少總多”說的成熟	(165)
第三節 “以少總多”說的多維凸現	(175)
第二章 “以少總多”說的本體闡釋	(185)
第一節 “以少總多”說的確立與界定	(187)
第二節 “以少總多”說的多維闡釋	(192)
第三章 “以少總多”說的批評模式與中西詩學的 雙向熔鑄	(202)
第一節 尚象：巨大的語義容量	(205)
第二節 比興：豐富的詩意空間	(213)
第三節 “以少總多”與中西詩學的雙向熔鑄	(227)
第三編 虛實相生：從宇宙大化到藝術表現	(238)
引 言	(238)

第一章	虛實相生基本觀念在先秦時期的奠定	……	(245)
第一節	先秦時期虛實相生觀念的奠定	……	(245)
第二節	虛實相生觀念在漢魏至唐代的發展	…	(260)
第三節	宋明時期：虛實相生與冲淡的藝術精神	……	(274)
第四節	虛實相生論在清代的成熟	……	(296)
第二章	虛實相生的要義	……	(331)
第一節	虛實相生的智慧背景	……	(332)
第二節	虛實相生的言說方式	……	(334)
第三節	虛實相生的要義	……	(342)
第四節	虛實相生與當代詩學研究	……	(357)
第三章	兩個實際批評的例子：《紅樓夢》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	(361)
第一節	《紅樓夢》：人生的幻與真	……	(361)
第二節	昆德拉的“小說智慧”	……	(375)
結語	再論中國文論話語及其重建	……	(386)

緒論：重建中國文論話語

引 言

當今中國學術界已日益意識到，整個 20 世紀中國的人文學科研究實際上都患上了“失語症”，全盤套用西方的話語系統，沒有自己的理論話語，大部分中國人文學科研究都削足適履地成了西方話語系統的注腳。因此，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呼吁，如果希望我們中國的學術研究在 21 世紀走向深入，我們就必須賦予它獨立的學術品格和文化品格，而這從根本上有賴於我們能够建立屬於我們自己的從而是具有中國文化精神特質的中國現代學術話語系統。這個新話語系統的建立不可能完全照搬 20 世紀以前的中國傳統學術話語，當然也更不能照搬西方話語系統，它必須是具有中國文化精神特質而又吸收全人類文化成就的新型話語系統。這就決定了建立中國現代學術話語系統的主力軍，既不是單純從事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的學科與學者，也不是單純從事西方學術研究的學科與學者，而必定是將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就都納入視野之內的比較學科及其研究者。因此，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在

現階段有其確定的歷史任務和目的，這就是為建立中國現代學術話語系統而盡職盡責，振臂高呼，切實工作。

中國現代學術話語系統也決定了中國比較文學的基本內容和方法。這個學術話語系統既然是屬於中國的，它就必須具有中國文化精神特質，它就決定了中國比較文學必須建立在對中國傳統文論經典和學術研究進行全面的清理和自覺的繼承這一基礎之上；既然是現代的，它就決定了我們必須在中西理論對話（而不是將一方理論去闡釋另一方，也不是僅僅比較一下異同就了事）的基礎上吸收西方理論對我國文化發展有益的成分，因而中國比較文學的基本方法之一應是對話法。

中國現代學術話語系統絕不能一蹴而就，一朝即成。因此，我們祇能從一個個帶根本性的具體問題入手，以具體問題為中介讓中西理論進行對話，在對話過程中凸現中西理論各自獨特的聲音。而這也就意味着如下三個方面：其一，我們所選擇的問題必須是國際學術界共同關心並且具有重要理論意義的問題，這樣既能對這些問題的解決起到實質性的推進作用，又可以在言說這些問題時以無可爭辯的事實顯示中國傳統學術話語系統的言說能力，從而使中國現代學術話語系統在逐步建立的同時就取得其應有的話語權力。其二，我們必須盡量讓對話各方的聲音得到最為清晰的呈現，祇有這樣纔能進行最有成效的對話，而不是獨白，或者是壓制某方的聲音使之不能被完全地表達出來並把不屬於它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它。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就某一具體問題將中西雙方觀點的具體的歷史面貌清理出來，讓它們以最為完整的形態參與對話。這一點對於中國傳統理論來說尤其顯得必要，多年來我們比較多地運用西方理論來切割中國傳統文化和學術，往

往不是歪曲、忽略事實，就是根本不對中國傳統進行切實的研究，祇是想當然地以爲它應該如何如何。其三，在對話終了，應該就這些具體問題以中國傳統學術話語爲基礎吸收西方理論之精華，融會鑄造出一些基本的理論和看法，並體現在若干核心概念或範疇之上，從而爲建立整個中國現代學術話語系統打下堅實的基礎，作好充分準備。

第一節 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 與重建中國古代文論話語

時間的巨輪已經轉到了 20 世紀末。

這是一個回顧與總結的時刻，更是一個翹首展望的時刻。

即將過去的 20 世紀，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大動蕩的世紀，是中國文化極其痛苦、極爲艱難的世紀。

在漫長的中國文化史上，也曾有過南北文化的衝突與融合，東西（中印、中日）文化的交匯與交融；但在這些交匯與衝突之中，中華文化始終根深柢固，處於主流和優勢性地位，體現了宏大廣博，兼收並容的恢宏氣度。然而，自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中華文化第一次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嚴峻挑戰！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不但轟開了中華帝國的金鎖銅關，而且也爲西方文化在中國傳播奠定了基礎，掃清了障礙。在民族存亡的危機中，中華民族爲了救亡圖存，經過痛苦的掙紮、反省，不得不“求新聲于異邦”，向西方文化學習，甚至不惜以“打倒孔家店”（傳統文化）爲代價。自“五四”以後，中國文化的根基第一次真正動搖了。

然而，自從“五四”打倒古文文化（傳統文化），提倡新文

化以來，整個中華民族就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處于一種十分尷尬的窘狀。

西化的結果，使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大大受到傷害，“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曾令多少有血氣的中國人義憤填膺，痛心疾首！聞一多滿懷追求西方文化的幻想赴美留學，然而，震撼他靈魂的不是西方的文明，而是民族的屈辱：“我乃有國之民，我有五千年之歷史與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將謂吾國人不能製殺人之槍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總之，彼之賤視吾國人者一言難盡。”^① 郁達夫小說《沉淪》之主人公，正是因這種民族屈辱而自殺，“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吧，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

巨大的民族屈辱，像夢魘一樣壓抑着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在屈辱與自尊的絞殺之中，扭曲了中國人的心態。魯迅小說《阿 Q 正傳》中的阿 Q 形象，正是這樣一種畸形心態的活生生的寫照。魯迅寫阿 Q，是想“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靈魂來”^②。關於阿 Q 這個藝術典型，學界多年論爭不休，曾有過多種解釋，但大多以階級性來論證，頗難自圓其說。其根本原因是沒有從民族心態上去認識，魯迅正是描繪了一種雖然老子先前闊多了，但在現實中卻受盡屈辱的畸形心態和靈魂。這是一種“中華民族靈魂之‘無靈魂’的體現”^③。

這種“無靈魂”的狀況，正是文化斷裂的後果之一。一個“無靈魂”的民族，便會逐漸失去嚮心力與凝聚力。然而，事實

① 《聞一多全集》第 1 卷，第 40 頁。

② 《魯迅全集》第 7 卷，第 81 頁。

③ 李歐梵《魯迅的小說——孤獨者與大眾》，見樂黛雲主編《當代英語世界魯迅研究》第 11 頁，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上，中華文化之根基雖然鬆動了，但並未斷根。許多“五四”時期倡導“西化”的知識分子，其靈魂之根，仍深紮在中國文化之中。就像藕斷絲連的戀人，在彷徨中痛苦，在痛苦中彷徨。正是由于這種矛盾和痛苦，我們纔可能理解許多文化人在西化與民族的抉擇中自相矛盾的言行。例如，胡適是首倡白話文學，力倡西化的人，然而，卻又是一個倡導“整理國故”的人；魯迅是打倒孔家店的旗手，是揭露傳統文化“吃人”、“殺人”本質的勇猛戰士，他甚至曾經號召青年不要讀中國書。然而，魯迅本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卻頗有研究，著有《漢文學史綱要》、《中國小說史略》，並整理校訂了不少古籍，如《古小說鈎沉》、《唐宋傳奇集》、《嵇康集》等等。郭沫若等文壇巨匠亦同樣如此。

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關係，成為 20 世紀中華民族的一塊心病，一個痛苦、扭曲、壓抑的情結。幾乎任何一次政治思想運動、學術文化論爭或論戰，都與此密切相關。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打倒孔家店”，從“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到“德先生，賽先生”，從“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到“為工農兵服務”，從“破四舊”到“批林批孔”，從“文革”的閉關鎖國到新時期的“改革開放”……中體西用、批判繼承、拿來主義、大破大立、全盤西化、西體中用……名目繁多的術語，無非都扭結到這一點，如何正確處理中西文化的關係。

曾有學者指出，由于中西文化巨大而猛烈撞擊而造成的民族心態的失衡，中國人在對待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關係上，常常是在自大與自卑兩極上滑動，“洋鬼子”與“洋大人”，這種截然不同的稱呼，往往同出一人之口。阿 Q 的特徵就是這種從自尊自大到自輕自賤，又從自輕自賤到自尊自大的既矛盾而又統一的藝

術典型。

如果我敢于捫心自省，仔細回顧一下 20 世紀這一民族心態失衡的痛苦歷程，不難發現由于盲目自大或自輕自賤造成的巨大失誤與失策。從表面上看來是某時期政治上的、甚至是個別領導者的失誤，然而實質上可能是整個民族心態失衡的苦果。

嘗够苦果的中國人，面對 21 世紀，是否會清醒一點？經濟上、政治上逐漸強大起來的中華民族，面對 21 世紀，失衡的心態是否應當正常起來？曾有人預言，21 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如果將這種話理解為 21 世紀中國將強盛起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話，那麼這種強盛在當今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富庶，國力上的強大，而且更是文化上的繁榮、民族心態的健康。

爲了 21 世紀中華文化崛起和繁榮，我們必須在反省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文化發展理論及其文化發展戰略。本節就是我們思考的一點心得。

21 世紀中國文化的基本走向何在？中國文化將怎樣發展？這是我們思考的邏輯起點。

如果說 20 世紀是東西方文化劇烈衝突、碰撞的世紀，那麼 21 世紀或許將是一個東西方文化對話、交融的世紀。世界在走向多元化，中國也正在走向世界。有學者認為，世界正處于一種“文化轉型”的過程之中。樂黛雲教授指出：“從 20 世紀後半葉，亦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開始，世界就已顯露了種種文化轉型的跡象，如：經濟上的多元化，由電腦帶動的信息時代，政治上殖民體系的瓦解，科學上和哲學上的最新進展，凡此種種，都有力地證明‘任何體系和中心都不是絕對的，不可更改的’。認識這一點至關重要，這導致了發達世界自我中心的解體，也就是以

歐洲為中心的文化建構的無可挽回的破碎。”^① 西方文化中心的解體，並非人們的主觀臆測，世界文化由昔日的西方文化霸權、“西方中心”走向各民族文化多元並存的格局（或曰多元化），已成必然之勢。21 世紀，將是多元文化相互對話、相互交融的世紀，還很可能是一個在對話與交融之中達到建構新體系、創造新文化的輝煌時期。人類文化發展史常常提示我們，世界文化的高峰，往往是在文化大交匯，尤其是異質文化交匯之處產生的。

這種多元文化的對話與交流，主要成就很可能集中在文化體系迥異的東西文化的相互對話與交融上。而作為遠東文明代表的中國文化，將在這種東西異質文化對話與交融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從人類文化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東西文化的大交匯導致的對話與交融，及其新文化的建構，很可能是全世界文化發展史上最輝煌的樂章！

從中國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文化轉型”，這種由中西文化對話而產生的交融，無疑提供了一次讓古老的中華文化獲得又一次生機的巨大機會。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良機！

基于這一認識，當 21 世紀即將來臨之際，中國文化的基本走向也就有了一個大致明確的方向。我們認為：21 世紀的中國文化，將不再亦步亦趨地仿效、追隨西方文化，更不應當再舉起“全盤西化”的奴才旗幟；21 世紀的中國文化，當然也決不可能退回去祇讀“四書五經”，復古倒退。中國文化，已經處於中西文化交匯的大潮之中，好比舟行水上，祇有順應這一交匯的潮

① 樂黛雲：《文化轉型與中西對話》，載《世紀風》1993 年 2 期。

流，纔可能發展；祇有主動適應、並推動這一潮流，纔可能登上輝煌之巔。

基于這種認識，我們將理智地告別 20 世紀關於“中體西用”、“全盤西化”、“西體中用”等糾纏不清的老話題，拋棄中西文化優劣論的機械判斷。而全力關注于中西文化的相互對話、理解，相互交流與交融；關注于中西文化各自的民族特色與價值，中西文化互補而又多元並存的可能與實現，尤其是關注對話、交流與互補之中萌生的文化新枝，關注在各民族多元文化基礎上重新建構的大廈，關注各民族，以其特有的旋律與音色交織成的世界文化宏偉交響樂的新樂章！

從這一認識出發來考慮中國文化的發展戰略，就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方向和思路。

21 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戰略的第一步，是要主動地迎接並推動世界文化的轉型，主動與西方文化對話。祇有首先開展對話，纔可能達到互相理解、交流與互補，也纔可能實現跨文化的創造與建構。

對話，首先要解決話語問題。各種文化有它不同的理論話語。這裏所說的“話語”（discourse）非指一般意義上的語言，而是藉用當代的話語分析理論（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西方的話語分析理論關注于與語言表達密切相關的社會文化意義的表達、解讀、溝通（交流）和建構的理論與方式。所謂話語，是指在一定文化傳統、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辨、闡述、論辯、表達等方面的基本法則。在文學理論研究上，話語分析理論已卓有成效。美國著名學者拉爾夫·科恩（Ralph Cohen）指

出：“文學理論就其範圍而言是一種有關話語的論述。”^①

然而遺憾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化基本上是藉用西方的理論話語，而沒有自己的話語，或者說沒有屬於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學、文學理論、歷史理論等等）表達、溝通（交流）和解讀的理論和方法。有學者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沒有理論，這是我說的，至少現在是這樣。當我們要用理論來講話時，想一想罷，舉凡能够有真實含義的或者說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範疇，到底有幾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過來）。如果用人家的語言來言語，什麼東西可以算得上中國自己的呢？”^②“近一兩年來，中國文藝理論的哲學含義，是以西方哲學為主導的。也就是說，近一百年中，就哲學作為理論形態的存在來看，文藝理論並不存在所謂‘中、西’方文論的哲學背景。……甚至，就文藝理論自身所具有的哲學性質來講，20世紀的文藝理論其實就祇是西方文論罷了。”^③的確，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以來，中國傳統話語就幾乎被遺棄了，人們紛紛操起西方哲學觀點、西方文論方法，紛紛用西方的話語來解讀和表述。在否定傳統文化藝術及其理論的同時，人們開始“求新聲于異邦”，于是西方五光十色的文學理論紛至沓來，從古希臘文論到浪漫主義，從批判現實主義到現代派文論，無所不用，無所不搜。建國後，又一頭撲在俄蘇文論的懷中，自新時期（1979）以來，更是多姿多彩，西方各種各樣的理論，都在中國文壇上大顯身手：從別、車、杜的

① 拉爾夫·科恩主編《文學理論的未來》，程錫麟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頁。

② 孫津：《世紀末的隆重話題》，載《文藝爭鳴》，1995年第1期，第60頁。

③ 孫津：《中西文論的哲學背景》，載《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頁。

典型論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說，從亞里士多德的悲劇理論到尼采的酒神精神說，從現代主義到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從現象學到闡釋學、接受美學……新名詞、新概念的狂轟濫炸，已逐漸成為人們司空見慣的事情。批評家們津津樂道於“能指”、“所指”、“張力”、“反諷”、“情結”、“原型”……面對當代文壇西方文論稱霸的局面，連一些青年學者也慨嘆道：“我們現在的大體狀況是，什麼都有，什麼都沒有——別人有的我們都開始有，別人沒有的我們也沒有。我們留給這個時代的最終可能是‘貧乏的理論’，因為那不是‘我的’。”^①

這種理論的貧乏，理論話語的失常，不僅僅表現在現當代，在古代文化研究上同樣如此。僅以古代文學為例，長期以來，人們幾乎習慣了用西方文論話語來闡釋中國古代文學，例如用現實主義闡釋杜甫、白居易，用浪漫主義闡釋屈原與李白。這種以西律中式的套用，問題很多。記得有一次開學術會議，幾位學者就白居易詩論是現實主義還是浪漫主義展開了激烈論爭：有人據白居易《與元九書》中“文章合為時其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等主張，斷定白居易詩論為現實主義詩論；反對者根據同一篇《與元九書》中“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一語，堅持白居易詩論是主情的浪漫主義詩論。這種狀況的出現，怕不能責怪白居易“自相矛盾”，而是我們今天的學者自身的失誤。

有人將這種中國話語的失落，稱之為中國文化的失語症。試想，一個患了失語症的人，怎麼與別人對話！

^① 毛時安語，參見曹順慶《中國文學理論的斷裂與延續》，《當代文壇》1988年6期，第19頁。

因此，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的第一步，是應當首先確立中國文化自己的話語，這是雙嚮文化對話的基本前提。沒有這一步，所謂對話祇是西方話語的獨白。在這一問題上，我們或許可以從美國黑人文學理論話語建構的努力中獲得一些啓發。

美國當代著名文論家拉爾夫·科恩主編了一本《文學理論的未來》（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 Edited by Ralph Cohen），書中將女權主義文論與黑人文學理論視為未來理論的兩大重要方面軍（據我看來，還應當加上以賽義德 Edward Said 為代表的東方主義）。科恩指出：“不言而喻，女權主義和黑人理論家是大規模政治和文化運動的一部分，他們旨在要求平等……這些理論家由于憤然反對那種排斥異己的做法、反對那種蔑視或否認其他可能存在的傳統的文學傳統而顯得極有分量。”^① 美國黑人理論家小亨利·路易斯·蓋茨明確提出了重建黑人文學理論話語的目標，他說：“我們自己的批評話語的狀況又是怎樣的呢？我們以誰的聲音講話？難道我們祇是重新命名從白人那一方那裏接受過來的術語嗎？正由于我們必須鼓勵我們的作家去迎接這場挑戰，作為批評家的我們也必須求助于我們自己思想和感情的特殊黑人結構以發展我們自己的批評語言。”“我們目前的任務就是要創立我們自己的批評理論，假設我們自己的命題。”^② 然而，在什麼基礎上來建構黑人的理論話語呢？蓋茨提出，應當在黑人自己文化的基礎上、在黑人土語的基礎上以及在黑人固有的批評傳統的基礎上來重新建立黑人的理論話語。他說：“我們必須根據我們自己的

① 拉爾夫·科恩主編《文學理論的未來》，程錫麟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② 小亨利·蓋茨：《權威、（白人）權利與（黑人）批評家；或者，我完全不懂》，載《文學理論的未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頁。